

谁成就了“最牛大妈”的车牌生意

□ 舒圣祥



时事评论

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摇号等政策后，车牌成为稀缺资源，但是一个名叫王秀霞的大妈却被曝名下拥有上千北京车牌，目前这位大妈已经申请将所有车牌注销，“租用”王秀霞名下车牌的车主，已相继接到北京市车管所电话通知，让他们前去办理车牌注销业务，在重新取得购车指标前，车主不得开车上路。(8月25日《羊城晚报》)

买车是消费者的权利，车牌号也只是一串数字组合，不需要一分钱投入，天然存在而且取之不竭。因此，买车上牌须经政府部门“行政许

可”，合理性本身值得商榷，这主要是现代城市为缓解交通拥堵，而要求人们作出的权利牺牲。既然是权利牺牲，那就必须做到公平。比如，北京之前规定上牌要北京户口，就是典型的户籍歧视；“最牛大妈”如此受人关注，原因同样在公平二字：凭什么别人买车还要挂她名下，向她“租”车牌，给她交“租金”？

当车牌成为稀缺资源，一般人可能得等上几年才能交好运摇到号，“最牛大妈”名下竟然拥有上千车牌，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得不让人想到传说中的黑幕。

不排除北京购车政策的不连续性，让“最牛大妈”钻了政策的空子，但事实真就如此简单吗？不管车管所信不信，至少公众不相信。摇号政策的暗

箱操作，在经适房等各领域曾被大量曝光，关于北京车牌摇号的公正性质疑亦曾时有发生，不管这些是否属实，但“最牛大妈”的真实存在，让我们对政策漏洞与公平性必须进行重新审视。

据北京市车管所透露，他们最近处理的三名“背户”人中，王秀霞名下车牌最多，其次是陈某名下有五六百个车牌，还有一人名下也登记有好几百个车牌。显然，倒腾车牌的生意不是“最牛大妈”一个人的故事。有关部门必须进行详查，借此告诉公众，“最牛大妈”们如何搞到这么多的车牌——只是个人钻空子，还是涉嫌寻租腐败，不能不明不白。

按一个车牌“租金”一万元计算，“最牛大妈”的上千车牌就是上千万元，如此空手套白狼

的暴利，不应该只是“主动申请将名下全部号牌注销”那么简单。“最牛大妈”们“主动申请”将车牌注销了，那些交了“终生租金”的车主们怎么办？不退钱算不当得利还是经济诈骗？更何况，暴利全都在“最牛大妈”们腰包里吗？如果有人参与分赃，是否应该追究责任？其实，“最牛大妈”名下拥有上千车牌，既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也是“薅一只羊的羊毛”；只要往数据库里一查，问题是明摆着的——又不开出租车公司，私人谁会买上千辆车？换言之，“最牛大妈”们的车牌生意，早就应该被发现被查处。为什么没有？是无心疏忽，还是有心纵容？不管怎样，“最牛大妈”们的车牌生意做得那么大，必然是因为有人严重失职。

别把独立思考缺失归咎于技术先进

□ 志 灵

近日，一项在全国范围对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数千名未成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如今，七成青少年依赖手机阅读，“几乎都不看书了”；排在青少年书籍阅读目的前列的是“打发时间”、“好玩”。报告称，浅阅读、泛阅读、碎片化的阅读改变了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喜欢看、喜听，不问为什么、不独立思考的习惯。(8月25日《北京晨报》)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维方式决定着将来社会和国家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少年不问为什么、不独立思考的习惯，让人堪忧。但若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厘清一个前提，即青少年独立思考的缺失和不少青少年依赖手机阅读之间有无必然联系。

当前，原本作为一种通讯工具的手机，越来越成为一种附加值逐步增加的移动便携式介质，承载了包括阅读在内的诸多功能。在如此便携的技术语境下，绝大多数青少年不依赖手机阅读，反倒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从这个角度看，依赖手机阅读和独立思考缺失之间并无排斥关系。

从技术进步的面来看，依赖手机阅读应当是方便独立思考而非相反。与很多年长者聊天时，他们经常感慨，现在看资料、做研究多方便啊，打开电脑上网，各种资料应有尽有，哪像过去核对个资料还要翻箱倒柜。这种感慨说明，技术的进步理论上应当有助于思考，毕竟一事当前，运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核实，既快捷成本又低。

这样看来，将青少年独立思考的缺失归咎于先进的技术手段，不仅有失公允，而且会遮蔽背后真正的问题源。事实上，青少年独立思考的缺失，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的大环境和我们的教育方式缺陷。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集中出现急功近利、流于表面的现象。而独立思考是一项既费神费力又很难立竿见影的行为，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独立思考，反倒一味苛求青少年为什么不去独立思考，是不是很具有讽刺意味呢？

独立思考最大的价值是明事析理，将事实搞清楚，把道理讲明白。如果社会上很多人都不讲道理，那么独立思考不仅会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通”一样尴尬，而且也很难有用武之地。

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中恰恰就有很多遇到事情不愿意讲道理的人，他们更倾向于以强弱对比的方式来摆平事情，加之一些政府部门在遇到这种不讲理的行为时，并没有很好地主持公道，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讲道理没用，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我们的教育则习惯固定答案式的束缚性教育，不利于学生多角度的思考。

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就会发现，所谓青少年不独立思考的问题，并非是技术进步造成，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革和完善我们社会的制度规则和教育方式，让讲道理成为一种习惯和风气，让教育能够容纳不同观点。

■ 漫 画

作 者/张建辉



《21世纪经济报道》8月24日报道，继上海有机蔬菜配送商“天鲜配”和辽宁百味园相继落马之后，7月22日，江西德上科技药业有限公司的两款有机产品亦被查出部分指标超标，这使得有机产品的安全问题再度递到公众台前。

目前有机食品认证存在乱象，有的地方花2万-3万就可买到认证。“有机认证这一块存在太多猫腻，以前有些小的认证企业拿钱就可以给你认证标识。”良食网CEO唐忠这样告诉记者。

“休闲经济时代”并不是“懒人社会”

□ 唐卫毅

近日，以研究休闲、休闲生活和休闲经济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接受了记者专访，他努力倡导休闲生活，号召人们积极转变观念，去有意识地放慢生活节奏。(8月25日《燕赵都市报》)

王琪延教授分析认为，“在北欧一些国家，人们在一个星期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依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经济增速低一点儿，如果每年能增长6%，到2030年，我国就可以实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的制度。”

“休闲经济时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休闲经济时代”不是“懒人社会”，而是一个科学、健康、文明、愉悦的快乐社会。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就是，休闲产业不够丰富和壮大，人们也不敢放开休闲消费，传统的攒钱、投资置业理念根深蒂固，很多人加班加点拼命工作，日夜忙碌。如此的工作状态，使生命质量难以保证，过劳死、英年早逝现象比比皆是。

会休闲，才会更好的工作，这是现代生活理念。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满足公众休闲欲望已经到了释放并且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有关部门理应组织专门力量，着手对“休闲经济时代”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设计。

电子眼外包“包”掉了法律尊严

□ 何勇海

日前，陕西兴平交通管理部门将电子眼外包给私营企业，企业雇用人员上路坐在测速车里拍照，每人每天查超速指标50辆，每月完成指标发给工资，超出指标再拿提成。(8月24日《新华社》)

电子眼外包并不限于陕西兴平，据新闻报道，早在10多年前，东莞当地政府不想出钱建设、维护道路监控设备，便让企业投资安装电子眼。这一做法当时曾作为“创新”案例，随即被一些地方“有头脑”的商人发现，被迅速复制到全国多地。

建设、维护道路监控设备，是为规范司机的驾驶行为，预防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发生，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岂能因财政紧张、警力不足等堂皇理由将“电子眼”外包，请企业越俎代庖？

电子眼外包“包”掉了执法公正。电子眼维护的是公共交通秩序，关乎公正无私的秩序行政，本应是公益性的管理手段，管理者也应是拥有执法权的公安部门，岂能被谋取私利的企业所左右？当电子眼外包给无利不起早的企业，企业就在替代公安部门搜集交通违法证据，用监测交通违法得到的罚款作为投资回报，这就难保其不会掉进“钱眼”，利用所谓的执法权牟取私利。

涉及执法、罚款等公权性质的服务不能外包，在这方面，我们该有公开透明的规定，以便对“电子眼”的使用加以规范。